

苏联哲学界对文化理论的探讨

汪 国 训

苏联文化研究勃兴于六十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探讨文化理论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化程度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培育新人即社会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高使命。正如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文章所指出的,文化问题,总是“永恒的”哲学问题,它成为二十世纪最有生气的问题之一,“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①二十多年来,苏联学术界就文化的定义,文化的本质,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的要素、结构、功能及文化理论的系统方法,历史-文化类型学和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模式等等文化理论的紧迫课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涌现出论述文化理论、文化哲学的专著与论文不胜枚举,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在许多观点之中,大体上有两种主要的观点,十分值得注意。其中一种以 $\Theta \cdot C \cdot$ 马尔卡良、 $M \cdot C \cdot$ 卡甘、 $IO \cdot A \cdot$ 日丹诺夫、 $B \cdot E \cdot$ 达维多维奇等为代表,他们的主张被人称为“工艺学”的文化观;另一种则以 $B \cdot M \cdot$ 麦茹耶夫、 $H \cdot C \cdot$ 兹洛宾、 $B \cdot \text{Ж} \cdot$ 凯列、 $\Theta \cdot A \cdot$ 巴列尔、 $Л \cdot H \cdot$ 柯甘等为代表,他们的主张被人称为“新人本主义”的文化观(以区别于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人类学观点)。

马尔卡良是当代苏联文化理论研究的权威。他比较重视西方文化学研究的成果,他的《文化论纲》(埃里温,1969)和 $A \cdot \Pi \cdot$ 阿尔诺利多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原理》(莫斯科,1976),被认为是苏联文化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初步形成的标志。②马尔卡良的其他著作还有:《论人的活动与文化的起源》(埃里温,1973)、《当代社会科学系统中的“文化”概念》(莫斯科,1973)、《文化理论与当代科学:逻辑方法论分析》(莫斯科,1983)等。

马尔卡良扬弃了通常把文化定义为“人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与发展的全部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之总和”的“价值学的文化概念”,也扬弃了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综合体”的经典定义。与强调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论者相反,马尔卡良强调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手段,是活动的特殊方式,是手段和机制的特殊体系,由于这种方式和体系,个人可以积极地对待周围世界。马尔卡良认为,不应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应看作是社会的功能,对社会来说,这种功能应理解为社会活动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包括超生物的制造工具和机器的体系。以马尔卡良为代表的文化学家大都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合乎工艺学要求的,他们大都从活动方式的角度设想文化问题,从人类活动的一般工艺学的意义上阐述文化的理论观念。他们所谓“工艺学”概念,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道德动机、审美情趣、世界观的观点。 $B \cdot E \cdot$ 达维多维奇、 $IO \cdot A \cdot$ 日丹诺夫在他们的《文化的本质》一书中写道:“设定作为社会过程的工艺学观点的文化,创造更大的启发才能,创造有成效的概念能力。这样的方法能够在文化现实生活中‘取得’文化,不局限于现象学学派描述的确定。在社会哲学分析的层次上,文化作为活动的人造工艺学的观念给我们提供文化的一般特征,提供文化最一般的抽象规定。”③马尔卡良等试图从理论模式的高度描述“文化”现象,其方法论的贡献在于,明确指出了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马尔卡良的文化理论还有不少漏洞,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作为苏联文化学史史上对文化进行系统考察的第一次极为认真的尝试,仍然值得珍视。④

麦茹耶夫、兹洛宾等人则不同意马尔卡良等人关于社会模式和文化定义的结构-功能分析,认为马尔卡良把文化定义为特殊的人类活动方式,从文化中取消了活动的主体和具有主体的社会关系特征的总和。也就是说,没有作为包括一定社会关系体系的活动主体的人的文化,便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活动。他们把文化当作现实的人的动态的创造活动加以解释。麦茹耶夫认为,“文化不仅存在于凝固的、固态的对象形式之中,

而且存在于积极地表现人类活动能力的动态形式之中”。兹洛宾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活动——包括过去的活动(固定的、实体化于文化价值中的东西)和现在的活动(以掌握和扩展这些价值为基础的活动)。”⑤麦茹耶夫写道:“文化是人在自己的社会改造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各种具体形式中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产。”⑥麦茹耶夫等对文化的定义,受到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社论的支持并成为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一书中的“文化”那章的定义。⑦他们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出发,联系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揭示文化的内容。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讲的文化,常常是指潜在于历史的、对象性的现实之中的人的东西。文化概念可以披露这些对象所具有的人的特征和人自身的对象性特征”。⑧这些学者强调,“文化本身则是社会创造力量总和之现实化,是历史的主动原则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历史进步的内容。”⑨他们常常回避“功能”一词,如若也把文化定义为人的自我发展的方式,那么就承认文化的人本创造性功能是主要的。总之,他们对文化作出了人本主义的解说。这就与前述马尔卡良的自然科学倾向有很大的不同。马尔卡良认为文化的主要功能是负熵的,具有适应性的,它在于在同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社会的自我保存和发展。

苏联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上述两种关于文化的定义看起来是互不相容,而实际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就作为完整构成的社会关系而言,文化的负熵功能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手段和方式的完善才可能履行,由于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因此,文化的负熵功能同时也是既作用于社会,又作用于人的人本创造性功能。对于社会,文化在塑造能够对相应社会关系实施扩大再生产的人”。⑩事实上,以上两种观点各自都有不少变化,他们在争论中也相互吸收。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和很难划归于这两种观点的其他一些专家对两种主要观点的批评之外,还有如 IO·M·洛特曼、И·Л·萨夫兰斯基等为代表的信息学与符号学的文化观,以及其他一些观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苏联学术界对文化定义的探讨更加明确,可以归纳如下:

1. 文化的主要源泉是社会的人的劳动;
2. 文化“场”包括社会的人的活动的各种方式和成果;
3. 文化的实质是人本创造性的,文化的重要的产品是人本身;
4. 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而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人的活动的,是受历史所制约的方式和成果的体系;
5. 文化进步的内容,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把人“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⑪

现在我们就麦茹耶夫、兹洛宾、凯列等人的“新人本主义”文化观进行一些探讨。

第一,关于文化的本质,文化与人的关系。

他们认为,文化是在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体系中展现人的本质的整个历史现象,正是在文化中并通过文化,内容丰富地表现出人存在的能动的和积极的原则,反映出社会的人自身依赖于改造对象的活动所形成的长期的社会过程。

他们指出,应该在人的活动中考察文化的物质的即客观的、有规律的源泉,排除把文化归结为物质的自然物体的属性,又排除把文化归结为纯粹意识的精神活动,超越文化的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他们从马克思《资本论》对商品的分析里获得了对文化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商品不是对象自身的本性,而是对象对于人的意义,即该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这是商品的价值本质。文化作为价值,具有人在普遍的、多方面的形式中活动的社会性,同时,它又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对象化。文化本质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征,正在从有社会意义的活动内容及其现实的社会实践方面得到揭示。文化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因此,应该在劳动中寻找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物质根源。

他们把社会劳动区分为抽象劳动和一般劳动,认为文化价值不是抽象劳动的结果,而是直接的一般劳动的结果。在一般劳动中,社会的内容与劳动的具体内容统一起来。在一般劳动中展现出文化实体,正是因为劳动产品中,社会关系不是以抽象的形式,而是以个体的形式,以具体的人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人们所创立的社会物质财富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文化的真正内容是作为社会生物的人自身的发展,即构成他的关系、能力、才干和需要的全部总和的发展。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

出他的全面性。按他们的意见,“人生产出他的全面性”,正应该作为文化本质定义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也是生产,但是特殊类的生产,这个类的主要结果是整个完整性和自己社会存在全面性的人自身。换言之,人在文化中是作为变化着、自我发展着的生物,作为主体也同时作为自己活动的结果。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构成人的全部社会历史的内容。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有可能成为文化史。

“新人本主义”学派认为,人的文化生产是在自己通过目的设定过程掌握自然的活动中实现的。在个体自我实现的创造中,在对象活动中获得一般的、文化历史的涵义——表现为历史的创造性,同时表现为人自身的发展。人借助于劳动改变自然,按人的能力尺度调整自然(即“第二自然”),也即是创造了一个文化世界。人同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包含有文化,在这种关系中的自然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

他们指出,人创造历史不是没有前提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个体当作历史主体,只有作为社会的人,只有去与其他人的活动交往中才能实现。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表现为文化历史的过程,文化本身表现为社会共同创造力的实现。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不取决于自然本身,而被社会、文化以及它们的发展水平制约。社会的发展同时是人的发展,从而也是文化的发展。文化是受人的实践制约的社会现象。文化归属于社会,具有社会性,而社会系统的运作和发展不可能脱离文化。文化对历史过程的主要作用是造就人,表明人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文化包括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全部总和。文化表征了个人对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人化”程度。因此文化不仅决定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的性质,而且还能动地参与生活方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人的类本性在文化中的表现和具体化,超出了直接给予的和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之外。人是文化历史过程的主体,评估生活方式的尺度是建立这样的生活,使得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在事实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才能,因而确立具有多维需求的个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的是全面发展个性。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文化的民主化和人道化的现实道路。

第二,关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多样与统一的辩证法。

麦茹耶夫、兹洛宾、凯列等认为,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问题,从它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问题。每一个人,而不是个别人对人类文化遗产(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价值)的掌握,乃是使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

他们提供了另一视角,他们谈到与哲学继承性不同的艺术继承性问题,认为艺术文化方面的继承性不仅比物质生产方面的继承性复杂,而且比某些其他的社会精神遗产(如科学)的继承性复杂。对遗产的需要根源于现在的生活,艺术传统的创新发展虽依赖于艺术的内部资源,却更依赖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艺术史的最重要的“合力”是非艺术的作用。这种“合力”是由一般社会关系和特殊创造关系的冲突构成的。在艺术史上积累的大量的范本和样式在文化发展的不同层次上,都可能被赋予现实的意义。因此,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艺术本身继承的东西与创新的东西是相互作用的。文化艺术继承性的特点在于,作为现实的价值和现时代创作的参照物而被继承下来的,不是个别的语言成分或内容丰富的情节结构,而是完整的艺术作品。过去的艺术遗产之所以能“参与”现在的艺术生活,是由于它们既具有时代的特征,又具有全人类的价值。作为艺术体系的个别成分是可以扬弃的,但作为完整的作品又是不能扬弃的。过去时代的作品既具有永恒性,同时又以完整的形式在后来的文化史中发挥作用。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与具体历史的东西的辩证法的基础。同一个旧的艺术体系的成分,既以扬弃的和单纯的形式介入今天的艺术生活,同时又继续出现在被保留下来的完整的艺术作品中。过去的艺术作品是以完整的形式参与现在的艺术生活,作品的原文甚至没有丝毫变化,而作品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并且作为组成部分进入了对世界和艺术的现代接受体系,被赋予了同今天的艺术探索相一致的性质。艺术史的一般特征是它的发展的“非直线性”,即后一时代并不是对前一时代成果的直接继承。艺术史也不能图解成“螺旋线”,图解成对以前时代的不断否定。传统不仅指向过去,而且还指向未来。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表现为地域的、民族的、人种的差别。他们认为,这些文化差别的起因应从形成那样变化的物质条件中去寻找。经过人的实践棱镜折射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原始文化的多样性。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是受社会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的一般性所制约的,任何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尽管有其全人类所共有的倾向,却都表现出它们自己的特殊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是历史过程多样性的起源,它使历史

过程具有多样色彩、多重节奏。对整个人类来说,没有统一的、从一个历史时代向另一个历史时代发展着的文化,有的则是符合人们存在与联合不同形式的许多文化。因此,文化研究的任务不是创造文化历史发展的演化死板图式,而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生活结构的多样形式进行论述与分类。真正的历史主义总是揭示和发现文化中的特殊、具体和专门的东西。

关于历史-文化类型的问题,按马尔卡良的意见,地域文化似乎构成类型综合——“地域历史文化类型”,在此基础上再现个别民族(或民族集团)的历史生活特点,再现它们的文化传统、交往形式的特殊性,以区别于“一般历史的文化类型”。麦茹耶夫等不同意见将地域文化“看成是历史-文化类型,认为地域文化不属于类型综合的种类。麦茹耶夫等把文化历史类型定义为“阶段体系”,这个体系在文化范围内反映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定水平。文化类型首先是社会人的自我生产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是受人们自己的物质生活、自己的社会关系与意识的生产方式制约的,即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他们认为,历史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构成文化类型的基础。文化类型由社会文化组织的系统构成原则而相互区别。这并不排斥种族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差别。每个民族创造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只有在与整个历史发展一定水平相互对比,与存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相互对比时,才获得特殊历史类型的意义。在这种相互对比之外,这个文化不是类型,而是个别现象,这种现象因此获得自己的名称——英国文化、法兰西文化、爱斯基摩文化等。

麦茹耶夫等认为,对现代文化的扩展不能作单值的评价。西方帮助一些国家吸收技术、科学、教育、美学等现代文明成果,但这一作用带有矛盾的性質,它往往导致旧有文化生活方式和精神标准的崩溃,却没有足够的新内容作替换,同时导致社会精神潜能的破坏,导致传统和现代的脱节,并使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不能参加社会文化生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亚非拉社会在文化领域中暴露出三种矛盾的类型,即“本族”(东方或非洲)文化和“异族”(西方)文化的矛盾,传统(现有文化不发达及保守性)和现代化(为保障社会生存发展而吸收新知识、技术、观念标准)的矛盾,种族或民族的文化框框和超国家的文化范围之间的矛盾。亚非拉国家处在“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的冲突之间。在这里,应当考虑传统结构和文化进程的深刻的多样性,考虑资产阶级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性。他们认为,不在于将文化和政治实践的现成形式,即西方已经完成了的进步和民主的理想,搬到另一个具有自己特殊性的社会中去。在不具备实践基础的东方国家试图引进另一种文化的成分,就会导致形式主义,纯粹表面地利用活动的方式,而不联系东方国家的需要。正确的做法是:十分注意群众的启蒙和使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成就,这有助于彻底更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

我们认为,这倒是真正地抓住了根本。文化开放和文化启蒙,从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上改造传统,使之转型与重构,对于我们这样国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国家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认为,西方文化不是普遍的,但在具体的西方各民族近代文化形态中的民主科学和工业文明则是普遍的、不能超越的。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曾经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文化也就好了”。^⑫从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发展文化和民主建设的问题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克服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在下意识层起这样或那样作用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培养和造就具有高度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和现代文化素质的人,需要好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其中特别包括知识分子“韧性的战斗”。

注释:

① 苏《哲学问题》,1981年第1期,第17页。

② 参见E·A·瓦维林、B·П·弗法诺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1页。

③ 参见B·E·达维多维奇、Ю·А·日丹诺夫:《文化的本质》,罗斯托夫1979年俄文版,第85页。

④ 参见康士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第2卷第5章,莫斯科1983年版;B·E·达维多维奇、Ю·А·日丹诺夫《文化的本质》,罗斯托夫1979年版;《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等。

⑤ 参见《国立莫斯科文化研究所学术论丛》第14卷,转引自《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

⑥⑦ 《哲学问题》1982年第1期;康士坦丁诺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第2卷第5章,莫斯科1983年版,第179页。

⑧ B·M·麦茹耶夫:《文化与历史》,转引自《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13页。

⑨ H·C·兹洛宾:《文化与社会进步》,转引自《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第114页。

⑩⑪ Л·科鲁格洛娃:《文化理论的迫切课题》,《哲学科学》1986年第6期,第26页,第25页。

⑫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1页。